

# 負傷者的身影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知識分子的心理困境與疏離

[臺灣]陳明柔\*

## 目 录

1. 前言
2. 負傷者話語與系譜構築
3. 啟蒙者與受殖者雙重印記
4. 現實的碰壁：以敗退作為書寫策略的多重意涵
  - (1) 知識分子精神圖譜的勾勒
  - (2) 「負傷者」精神系譜的開展
5. 負傷者的困居與突圍

## 1. 前言<sup>1)</sup>

在1920年代臺灣的社會文化運動開始呈現蓬勃之姿時，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也在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刺激之下漸有開展，至1930年代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更在現實環境的變動之中，結集了更多的臺灣知識分子投注心力於其中，並出現臺灣小說的豐收期。在1920年前後初登台灣歷史舞台，具現代精神的台灣知識分子，他們在台灣的殖民地現實中擔當著「觀念精鍊化」(idea-articulation)<sup>2)</sup>的

\* 台灣 靜宜大學台文系副教授。

- 1) 本論文修訂承蒙三位匿名評審人提供寶貴意見，筆者因此得以完備本文未及周延處，謹此致謝。
- 2) 關於具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如何擔當「觀念精鍊化」(idea-articulation)，參見：〈「理論－實踐」的轉型與安置〉，《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台北：東大出版，1991，頁91。文中對於知識分子角色定義的討論，有精到的論說與引介。

任務。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同時兼具理論與社會實踐的雙重性格，他們經由各種知識觀念的引介、詮釋、批判與建構，為殖民地處境的台灣提供與世界思潮同步的新觀念與新知識。臺灣知識分子因其受殖者身份對自身處境的反思，而對殖民地現實與歷史有其敏銳觀察與深刻參與。於其從事社會文化運動之際，他們於文字篇章中往往也表現出對於科學理性、民主自由等新價值觀的宣揚與信賴，這些觀念構成其思想意識的基質，也是他們從事啟蒙工作時主要的精神依歸。臺灣知識分子在其論說性的文字中，表現出的是對這些新世界觀追求與崇奉的熱情。即使殖民地現實的存在處境是不堪而令人沮喪的，但他們卻往往在其理念揭示的文字中，表現出一往直前的熱情與勇氣，那是對於理想烏托邦的想望與追尋。然則這樣的熱情與勇氣，在他們以反映社會現實為目的的寫實主義文學作品中，雖也形塑出許多為奔赴理想，或投入社會文化運動而奮勇直前的人物，但更多的卻是熱情勇氣的受挫甚至殞歿，在許多小說文本中呈現的，往往並不是理想、信念的宣揚，而是經由寫實手法，將生活之挫敗，與理念宣揚 / 現實實踐之間反映出的落差具體表現出來。

近年來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面向日益拓廣加深，不論是史觀、主題、作家或文化研究面向的論述，在陳芳明、施懿琳、廖振富、陳培豐、黃美娥、柳書琴、游勝冠、陳建忠、張文薰、王惠珍、朱惠足……等台灣學者開展下，諸多論題皆已累積質量俱精的論述。關於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樣態及其所面對的精神困境，施淑先生的幾篇論文：〈日治時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治時期的左翼文運動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分子〉、〈感覺世界——三〇年代台灣的另類小說〉、〈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sup>3)</sup>，多面向的論析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之各種現代精神樣貌。發表距今已逾十年，然施淑先生衍繹關於知識分子及其時代處境與文學表現的諸多論點，於今對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精神系譜而言，仍極具啟發性。許達然發表於2004年的〈楊逵小說裏知識分子的疏離〉<sup>4)</sup>聚焦於知識分子疏離

3) 這幾篇論文皆收入施淑先生，《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年1月。

4) 該文收入《「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靜宜大

的心理狀態與現實處境，並嚴謹地鋪論闡釋「疏離」(alienation)一義，文中以楊逵小說為討論對象，雖未旁及日治時期其他小說文本中之相關論題，然其論述對於本文全面爬梳日治時期小說相關論題時，仍極具參照價值。

同時針對日治時期小說研究，與本文負傷者主題可互為參註者，如解昆樺〈左翼的疼痛：朱點人〈打倒優先權〉、〈島都〉、〈秋信〉中的身體經驗〉<sup>5)</sup>，該文通過論析朱點人小說對勞動者身體疼痛經驗的負傷書寫，賦予勞動者「左翼化的身體」的集體形象。石廷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以社會事業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sup>6)</sup>，則是通過日治小說中受殖者「離農轉工」現象，針對殖民地文學中「窮民」、「失業者」形象進行分析，並論析文本中大量的貧困書寫，實可視為回應帝國統治話語的另一種策略，日治時期小說中初大量揭露的底層殘酷貧困的真實，雖非集中於知識分子的負傷身影，但卻可視為另一種社會集體負傷的參照。另外，柳書琴〈勤勞成貧：台北城殤小說中的博覽會批判〉<sup>7)</sup>，以郭秋生〈王都鄉〉、朱點人〈秋信〉為例提出「城殤小說」現象，文中以空間的興毀為隱喻，以「哭城」與「城殤」聯結台灣人遭受的民族差別處境，在此城市空間成為集體負傷的物質基礎，通過對清代舊建築群有形毀棄的哀哭，揭露被遮蔽的本土社會困境與殖民主義教化論述。柳書琴標舉的城殤類型的小說，實也曲折呈顯台灣知識分子集體負傷的抽象精神狀態，而這些以城市空間為喻體的文本中，其曲折呈顯台灣知識分子集體負傷的抽象精神狀態，又可視為創作者／知識分子與殖民主義對話之喻依。本文即於前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以日治時期台灣感覺結構中，以作家筆下「負傷者類型」為

學台文系承辦，2004年6月19-20日。

- 5) 解昆樺〈左翼的疼痛：朱點人〈打倒優先權〉、〈島都〉、〈秋信〉中的身體經驗〉，《台南大學中文系第一屆「思維與創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台南大學中文系，2007)，頁29-49。
- 6) 石廷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以社會事業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11)，頁102-108。
- 7) 柳書琴〈勤勞成貧：台北城殤小說中的博覽會批判〉，「第十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2013年10月25-26日。

研究對象，聚焦初登歷史舞台的台灣知識分子，進行系譜系的整理、詮釋與分析，嘗試論析他們除了啟蒙者形象外，作為創作者的知識分子於小說文本中，同時呈現出何種心理困境，及其與現實疏離後產生的孤寂感。

## 2. 負傷者話語與系譜構築

本文以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為中心，觀察他們在作家筆下呈現的類型差異與象徵，筆者認為，文學作品書寫往往可對應作家當時所處的感覺結構。所謂「感覺結構」，可理解為在特殊時空中，對於生活特質的感覺方式，而這些感覺方式並結合成為思考與生活的方式<sup>8)</sup>，因此在掌握感覺結構的變遷時，關切的會是「生動鮮活地活著與感覺到的意義和價值」<sup>9)</sup>。文學作品中表現的社會內容與情感精神，往往掌握了各時代的當代人正活生生經驗著的實際經驗與情感意識的鮮活狀態；而前述被凝固於文本的各種即時而生動鮮活的現實與精神狀態，則可在某種特殊的活躍「閱讀」中，使其現身。若循此，檢視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化情境，可發現被殖民者對植基於特殊顯著的殖民地時空特質，構成的諸多現象與感知方式之變遷，開始尋求其對話與對應的形式，並由此發展出對應殖民地新時空背景的感覺方式與精神系統。也就是說，生活於殖民地時空的台灣人，經由伴隨殖民體制而來的新興社會活動，生活內容或習性，甚或由此而造成的認同對象的混淆與轉移，意識到一種新的生活特質正在形成。而台灣人因共同的被殖民者處境，而在當時共同經驗的存在感中，分享（或共構）各種特殊的集體經驗。

日治時期伴隨殖民體制被橫向植入的西方文化思潮，以及異於清領時期殖民者帶動的政治經濟體系的快速變動，乃至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帶來的生產 / 生

8)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2, first published by Chatto Windus Ltd, 1961), p47。

9) 出處同前註。

活方式的變化，快速密集湧現的各種物質生產、觀念變遷，與個體生存所依恃的價值與意義系統交互作用，人們對於日漸積累的新文化體質，逐漸發展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態度。在時代的變局當中，台灣社會也進入一種新舊價值交混過渡的狀態，日治時期此種可被覺察的、或未及被覺察但確然發生著的變遷狀態，具體形之於社會表層者，便是勃興於1920年代而消蝕於1930年代的各种殖民地社會文化運動，以及蓬勃發展的諸多文學創作與社團。而這些具體的物質變遷與意義系統交互作用，則印證於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感覺結構的轉變，並具顯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史變遷。

通過前述研究脈絡，本文以負傷者系譜建構為主軸，嘗試揭示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子的「知識份子類型小說」之心理困境與疏離書寫。因為此類型文本保有創作者直接的主觀情緒，文本呈現且具「觀念精鍊化」的語言鋪述與情緒演繹特色。本文同時試圖明確辨識台灣知識階層作為「文學作品敘述者」時，如何將其感覺樣態凝固在作品中；相對於文本敘述者身份，當日治時期台灣知識階層同時以文化啟蒙者、社會運動者身份，於公共領域進行社會議論時，兩者因表述身份差異，其言論性質與情感樣態，因而呈現出一者低迴、一者高亢的強烈落差。前述深具落差對比的話語屬性，卻又是兼具文學創作者與社會啟蒙參與者，對其正經驗著的鮮活現實情境與情感意識的不同對應策略。而作家同時更在意識和潛意識層次，統整和呈現台灣知識階層的進步理想、生存壓力、心理困境，進行多形態的話語鬥爭。再則，本文嘗試以具體文本案例為證，將1927年左右翼陣營分裂、1931年社會主義運動遭打壓達至高峰，以及1930年代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盛行等等因素，對貧困書寫及負傷者身影之形塑產生的不同影響，進行區別，並以之照應不同時期負傷者形象的階差異、內部分別、及其與當時社會脈絡間的關聯性；進而指出小說文本中出現的負傷者身影，同時以揭露個人內心傷痕，及因體制施加導致的社會性的負傷書寫，作為作家抵殖反擊的策略。<sup>10)</sup>

10) 關於本文嘗試論析之觀點，感謝評審人相關意見的收攝與建議。

### 3. 啟蒙者與受殖者雙重印記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之萌發，初始乃以啟蒙的工具性價值而開展的，當日台灣知識分子往往同時有著文化運動者、社會運動者、小說創作者等多重身份，他們以「現代人」的姿態登上台灣的歷史舞台，以其所信奉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與殖民者意識型態交鋒，展現了迥異於其前傳統台灣文人的精神風貌。這批接受新思想洗禮的新知識分子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的開創者與奠基者，當我們進行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研究時，在大量的小說文本中，往往看到「台灣知識階層」的身影不斷進出於各種小說文本中，成為或隱或顯的「敘事者」此一事實。

多數作為菁英分子的台灣知識階層，約莫都出生於世紀之交的前後十年，他們受的是以現代精神為肌理的新式教育，其青壯年時代，則大致處於文化協會對台灣社會基進推動文化運動進行啟蒙之前後，這些知識分子是與台灣傳統文化逐漸產生斷裂的世代，他們在面對台灣無路可出的殖民地處境時，奮力實踐他們所接受的反逆封建勢力，進而以伸張個人自由為基調之啟蒙精神；同時也以受洗自世界思潮的左翼觀點，嘗試推動台灣社會文化運動，這些精神價值的實踐，也同時開啟了台灣文化發展的新貌。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於殖民地現實語境中以不懈的鬥志，積極從事社會文化啟蒙運動，並在面對新思潮衝激與臺灣現實困境的雙重刺激下，逐漸形成其建構理想「新世界」的思想意識，嘗試以之解釋臺灣殖民地的存在現實與歷史處境，並試圖提供另一套抵抗殖民者統治意識的新價值觀與世界觀。

台灣小說中「知識分子」的鮮明形象，是直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方才大量出現於小說作品中，當時日本統治者因對外侵略的軍國主義策略確立，因此對其國內一切可能阻礙法西斯軍國主義發展的異議言論與異端分子開始進行掃除。而在統治者的政策導向下，臺灣的社會文化運動亦因此而遭到殖民者強力的壓制與掃盪，日本當局於1928年起開始對日本左翼知識分子進行大檢舉，這也使得臺灣社會文化運動的組織受到相當的傷害。1930年代後，社會文化運動者的活動漸告沉寂，臺灣知識分子因無社會文化組織團結，也逐漸四

散，沉寂、甚或背離原本遵奉的理念原則。然而也是在這個階段，小說中開始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樣貌進行較為立體鮮明且深刻的表現。轉入文學創作的臺灣知識分子以虛構的文學作品，描摹出自己與現實抗爭時的側影與精神樣貌，同時也在小說中以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為我們留下了他們在與現實勢力搏鬥時的各種樣態。

雖則自1920年代之後，臺灣知識分子一直是站在群眾之先與殖民者對抗，希望將臺灣人推進自尊平等理性的生活境遇，他們也因此形塑出「文化啟蒙者」、「社會運動者」、「異端分子」、「虛無困頓者」等鮮明的角色形象。然而就臺灣被殖民的事實而言，他們仍是被統治者、弱者，身為次等國民的事實，並不因他們敢於與殖民者對抗的言行而得到改善。就此點而言，他們和全體臺灣人一樣都是被統御的弱者，殖民者為了遂行其高壓統治的目的，更將身為異端的臺灣知識分子視如仇敵，也在現實中蓄意給予他們更大的挫敗與凌越，殖民政權為鎮壓其反殖民地的聲勢，常以統治者之勢凌駕臺灣人之上，恣意侮辱，完全無視「人」之存在尊嚴，關於殖民者踐踏嘲諷「知識分子」生命尊嚴的事實，新文學創作者在當時的小說中有著頗為沉痛的描寫，而在其敘述之中，不僅將「知識分子」所受的屈辱表現出來，同時也藉此傳達了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改造現實時的無力感，及其受困於現實中，無路可出的負傷者之心理困境及疏離感。

是以本節將通過作家自身處境及其虛構文本之雙軸，勾勒同時烙印「啟蒙者」與「受殖者」雙重印記的知識分子身影，爬梳日本殖民時期具代表性的負傷者文本。日治時期台灣知識階層登上台灣歷史舞台之初，其精神上即揹負著啟蒙者與受殖者雙重印記。日本政府以其殖民者優勢在台灣構築出的存在語境，成為台灣知識分子無可遁逃的現實；而接受自現代化教育及世界思潮刺激後形成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則又迫使他們走上與傳統絕裂，並以自我觀念踐履者的姿態與殖民勢力交鋒的道途。然而這些知識分子除了是台灣現代文化之開啟者與精神改造者外，同時卻也在自我的被殖民身份中，深刻感知了作為被殖民者現實與精神雙重受困的疏離感。因此，檢視以寫實主義為主要風格的日治時期

小說文本時，可以見及台灣知識分子於小說文本中，檢證其建構的思想意識實踐之可能，並重新審視「知識分子」身份，是以經由日治時期文學作品的分析與詮釋，可將當時臺灣知識分子的角色樣貌更為具體地呈現出來。

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疾力呼求啟發民智，宣揚各種新思想，並以行動抗拒被殖民命運從事各種文化、社會運動之同時，許多人也同時投入文學創作的行列。於社會實踐的現實面，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在社會文化運動中，嘗試積極喚醒臺灣人的自覺意識，進而為臺灣爭取具有尊嚴的存在地位，因此就其作為社會文化啟蒙者的層面而言，其角色對當時臺灣社會所具的積極意義乃是不說自明的。然而此一鮮明的「反對者」角色，揹負的是日本殖民者對台灣人自我意識的壓抑與歧視，以及種種具體的非難與壓迫。而這些社會文化運動中遭遇的挫折與無奈，及由之而呈現的諸多面向，與及其從事社會文化運動時的理想性與積極性是相異的。同時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嘗試為台灣人積極勾勒的是理性尊嚴的理想世界之前景，而此種為抗拒殖民者而展現出來的烏托邦理想的實踐與追求，乃是他們從事社會文化運動、啟蒙解放臺灣的主要策進力量，然其規劃出的具革命意義之烏托邦理想，在他們推行社會文化啟蒙、經過現實的檢證與考驗後，卻充滿了失落於現實的悲劇色彩。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在與殖民者統治體制、傳統文化封建思想進行抗爭時，遭遇到理想執著與現實失落之間的兩難和無奈，而從中所呈現出來的帶有悲劇色彩的理想主義者的面相，在他們所信仰的充滿積極意義的世界觀時是所無從見及的。

當日的知識分子大力引介各種思潮，親身投入社會文化運動，嘗試以理論與行動實踐，為台灣深具特歷史文化背景的社會現實，構建足可改造民智、動搖台灣殖民社會不合理現況的觀念體系。同時「新文學」觀念也於此時引入台灣，自1920年7月陳炳於《台灣青年》發表〈文學與職務〉起，台灣知識分子針對文學形式的變革及其應當傳遞的內容，展開大規模的對話與論辯<sup>11)</sup>。基本上，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日治時期知識分子因其受殖者身分，具體思索台灣處境

11) 相關論題可參見陳明柔，〈新與舊的變革：「祖國意象」內在意涵的轉化——試以張我軍文學為中心的探索〉，收入彭小妍主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出版，1996。

與出路而開展出來的，因此文學論題最初的被提出，是被涵蓋在如何普及文化、啟蒙群眾、與殖民政策對治的社會文化運動命題中，當作一個衍生的子題討論的。因此，台灣新文學的建構與實踐，是以具有工具性價值的形式登場的。同時相應於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台灣社會文化運動趨於複雜的運動形態，以及運動方向的轉移，台灣新文學運動因其內屬於社會文化運動發展的特性，而在理論建構與關注焦點上也有階段性發展的差異<sup>12)</sup>。循此，檢視台灣文學於1920年代萌芽之初，小說主題大量集中於對封建傳統與殖民者惡行之正面揭露。然而在那些被日治時期絕大多數創作者賦予啟迪民智重任的小說文本中，卻因其寫實主義的風格，往往又呈現出：同時承載著扮演時代先覺者的知識分子，對於殖民地社會主義不容辭的批判，及身為被殖民者無路可出的困頓無奈。因此在許多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往往與現實中大力鼓吹革新改造的行動者角色有所落差，反而更常以理想失落與生活挫折的角色典型出現於文本之中。而在這些小說中，也就同時看到知識分子角色因現實理想不得實現、因殖民統治逼迫、因封建勢力壓抑而被扭曲的心理困境，或是呈現出受困後向頹廢深處沈淪的精神狀態。而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兼具啟蒙者與受殖者雙重印記，也具體烙印在他們「在被殖民與宰制的疏離經驗裏」<sup>13)</sup>，及因此而造成的存在張力與抗爭挫折之中。

1920年代日治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面對被殖民的歷史現實時，為抵拒殖民者，往往是以積極奮進的文化啟蒙者或社會運動者形象，展現其集體特質。因此具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啟蒙者角色，與走向社會主義的左翼知識青年，便成為小說中具典型意義的鮮明類型。這些人物在小說中往往是藉著揭發現實中殖民體制的威壓，從而對臺灣人存在處境投以人道的關懷，或向封建禮教挑戰以期突破傳統的網羅，展現其「知識分子」之特質的。追風的〈她要往何處去〉<sup>14)</sup>

12) 參見陳明柔，〈第四章 第二節 台灣社會文化運動沈寂後新文學運動之理論建構〉，《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3。

13) 引文見許達然，〈楊逵小說裏知識分子的疏離〉，《「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靜宜大學台文系承辦，2004年6月19-20日，頁8。

14) 追風，〈她要往何處去—給苦惱的姐妹們〉，原載《臺灣》第3年第4號-第7號，1922

中，首先登場的便是充滿個人主義色彩與啟蒙意識的青年男女清風、桂花與阿蓮，展示的是1920年代初，粗具啟蒙意識的知識青年之形象，他們為愛情而不惜與傳統媒妁的婚姻絕裂，以及在傳統婚約破裂後選擇遠走帝都，試圖以個人的成長促成日後島內女性覺醒的宣言式的自白，正呼應了台灣社會文化運動啟動之初，知識青年希望以嶄新的世界觀以及個體覺醒的訴求，為台灣勾勒一個全新遠景的意圖。

異於〈她要往何處去〉中昂揚迎向挑戰與挫折的知識青年身影，楊守愚的〈決裂〉中的主角，則是以左翼知識青年的形象出現。〈決裂〉發表於左翼思想檢肅之後，台灣社會運動已漸消沈沒落的1933年，與〈她要往何處去〉的發表年份相差11年。這段時間內，台灣歷經社會文化運動初興、茁壯、分裂，殖民者進行全面掃蕩的各階段，小說文本中的知識分子身影也不再只是堅定迎向挑戰。〈決裂〉中被勾勒出的知識分子形象，不再是純然個人主義式的人物典型。〈決裂〉中那一對因「戀愛至上論」而結合的戀人，婚後卻因丈夫「朱榮」堅持參與社會農工運動，不惜背叛自己所屬的階級，而終致與妻子決裂，最後與妻子湘雲及其家族成為處於對立面的怨偶。朱榮與湘雲是兩個不同類型的人物，他們的「決裂」實則深具象徵意涵。湘雲追求的是個人主義式之情愛生活的無憂與完美，因之對於丈夫積極參與社會文化運動極為不諒解。若說湘雲表現出來的是對於個人主義式的「戀愛至上論」的信奉與追求，朱榮則是從個人主義出走，轉入社會主義行動行列的左翼實踐者。顯然地，作者以湘雲與朱榮的對比，將社會主義者的形象具體表現出來，也為我們呈現了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在自我啟蒙過程中，追求不同價值觀的「知識分子」——戀愛至上論的個人主義者，以及信仰無產階級革命解放可能性的左翼知識青年，在思想本質上的矛盾與對立。通過不同思想體系的衝突，其中不論是朱榮、湘雲、此刻併肩的戰友，或已然轉向的昔日同志，其角色喻託的思想差異，也將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身處的時代思想氛圍，更為真實而切近地描繪出來。朱榮斷然與妻子決裂的宣言：

---

年7月-10月出版。

你既然反對我的主義，阻碍我的工作，那我倆當然是勢不兩立了。你的反動行為，在我的眼中，也祇是我的一個仇敵……<sup>15)</sup>

朱榮的宣告，不僅是一對夫妻的相互棄絕，同時更寓託著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思想的進一步分化，在這一對夫妻充滿象徵意味、具多重意義的決裂行動中，我們看到的是當時臺灣知識分子陣營中，左派與右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決裂、無產者與資產階級的決裂。在此種多義的「決裂」中，也同時反映著二、三〇年代台灣知識群體，面對不同價值及觀念體系交互作用下，殖民地經驗具體鮮活的當即性。

另一方面，小說中不斷出現並變化為不同寫作者（現實中的知識分子）經驗載體的知識分子角色，實際上也具現著個體在社會現實情境中，因為各種客觀處境與意義系統的交互作用，而漸次形成的「生動鮮活地活著，與感覺到的意義和價值」<sup>16)</sup>。相對於現實中不斷被鼓吹的具啟蒙意識、變革力量或反動色彩的話語，這些角色之現實際遇與衝突，不僅作為推進小說的情節，其經驗及境遇在被不同作家不斷複寫之際，實則也相對封存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生活中，真實鮮活的經驗與感受。龍瑛宗於1937年嘗於一篇受訪報導中，如此陳述〈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創作動機：

我只是台灣銀行的一個職員，自小雖然對文藝感興趣，但寫作品這一次卻是為頭一遭。〈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我想把中學校畢業的本島知識份子的面貌及其背後社會的、經濟的關係現實地予以處理才寫成的，之所以以苦惱地活在封建殘渾的知識份子之生活為主題，就是因為不懂其他世界的我的生活環境使然，…我是想把本島人現實的生活內面向內地介紹。<sup>17)</sup>

於此龍瑛宗除了陳述其創作動機外，同時也某種程度地說明了和他一樣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殖民地的特殊時空中，對於自我存在處境以及社會價值朝向現代

15) 楊守愚，〈決裂〉，《楊守愚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243。原載《臺灣新民報》第396-399號，1933年1月1日、9日、16日、23日出版。

16)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2, first published by Chatto Windus Ltd, 1961), p47, p63。

17) 作者不詳，葉笛譯，〈中央文壇之彗星——訪問〈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作者龍瑛宗君〉，發表處不詳，收入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八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197。

化變遷過程的感受。在這些寫實風格的小說作品中，許多作者鋪陳諸多時空細節與人物情節時，實際上也將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確然面對的感覺結構，勾勒於小說中；即便這些當下經驗或心理變化，在當時尚未被整體論述，甚或並不被視為具有社會普遍性。但在大量的小說中卻具現了日治時期台灣知識階層對其生活的感知方式，文本中對於知識分子現實處境的描繪及心理狀態的勾勒，實際上正對應著台灣知識分子當下的受殖經驗，及其面對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時，所產生的心理困境和疏離。前述的心理困境與疏離，與當時被積極宣揚、具抗爭性與行動力的社會文化運動觀念未必相符合，但卻是1920至194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真實的存在情境。

#### 4. 現實的碰壁：以「敗退」作為書寫策略的多重意涵

##### (1) 知識分子精神圖譜的勾勒

如前文所述，不論是小說文本中像「朱榮」或楊君（〈送報伙〉）這類從事社會運動的左翼知識青年，或楊逵這樣於現實生活中具行動力的社會運動者，他們在面對日治時期「現實的碰壁」時，都有著相近的精神特質。也就是他們都在被殖民宰制的疏離經驗中，奮力抗爭，並希冀以抗爭作為掙脫殖民疏離經驗的手段，同時作者對角色的描寫，也定格於具左翼精神的積極狀態。然則如朱榮、楊君雖同樣具有試圖與殖民者／資本家拼搏的精神，但小說完結的情節安排卻各有殊異。〈送報伙〉中楊君在帝都接受無產階級革命觀念洗禮後，成為行動者，返鄉時似是懷抱了某種可以拯救台灣於殖民者／資本家水火之中的決心，角色揚溢著楊逵作品特有的樂觀昂揚特質。然則同樣以行動者角色登場，並走到資本主義勢力對反面的朱榮，雖然振振有辭地為自己抉擇的信仰論辯，然則於殖民者／資本家面前，終究還是以一個敗退者的姿態被捕了。朱榮選擇與妻子決裂終而被捕的情節，寓託的正是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無從獲得本

質的平等自由的殖民地存在語境，以及台灣社會集體碰壁、無可遁逃的現實。

睽諸殖民地台灣的現實處境，台灣知識分子對於當時台灣整體文化的發展，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自不待言。是以〈決裂〉中的「朱榮」最後雖以被捕的敗退者形象退場，但其積極抗爭不惜決裂的知識分子形象仍極具象徵意義。然而在其奔走宣揚其文化／文學理念與熱情之際，他們真實面對的卻是不堪而沮喪的殖民地現實，因此必需承受受殖者宿命的創痛。在現實中奔走呼求的甚具革命意義的烏托邦理想，實際上從未具體實現過，相應而來的反是失落於現實的無奈疏離感。在面對殖民地現實處境時，小說中類似朱榮、楊君的角色，仍以積極而富勇氣的行動與現實決裂，繼續朝無產階級革命的路途邁進。同時在二〇年代後期以降的小說中，類似朱榮的人物，多半是以沒有姓名的「講文化的」、「過激人物」、「x x 主義者」一類的角色登場<sup>18)</sup>。然則這些角色卻未必皆如楊逵〈送報伙〉的楊君，充滿昂揚的生命氣力，許多文本中知識分子精神樣態是被多面向呈現為敗退者、虛無者，甚或是轉向、背叛了自己理念信仰的機會主義者，而這些角色實際上也相對地投射著許多作家的面對現實無路可出的困境與存在感。

發表於1932年自滔的〈失敗〉，其中即有多類型的知識分子角色同時登場。小說中曾因參加啟蒙運動而入獄數月的醫生，在脫離解放運動的戰線之後，與那些「為窮人爭取利益的鬥士們，卻也很接近的」<sup>19)</sup>。雖則他仍與社會文化運動者過從甚密，然其實際生活卻已由「解放運動戰線」的陣營，轉向小資產階級興致勃勃的娛樂、消遣，並以打牌發出另一種「戰鬥之聲」。於小說中群集在恒春醫院討論統治者無理捕捉、處罰小販的聚會中，同時出現了幾種角色類型：醫生（轉向後的文協會員）、B先生（御用紳士），合群（仍活動著的文協會員），抱平（勞工運動者），以及小販（順從馴良的被殖民者）。其中擁有社會地位的醫生，建議「合群」取消集結小販的抗議大會，轉向統治者求助妥

18) 參見施淑先生，〈書齋、城市與鄉村——日據時代的左翼文學運及小說中的左翼知識分子〉，《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頁74。

19) 自滔，〈失敗〉，《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3：豚》，台北：遠景，1981，頁71。原作寫於1932年2月3日，原載《南音》1卷12號，1932年11月8日出版。

協，而被合群譏斥為機會主義者，與醫生形象對比的是，「合群」與「抱平」這兩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運動者，這兩個角色面對現實的不公義時，彼此對於社會運動已有歧異，但仍思索著：

到底用什麼法子，來將這整群窮苦的小販，拯救出恐怖飢寒的領域。要怎樣引導這勤勞的被壓迫者，跑向光明的大道上。

呀！不，不，抗爭，抗爭。為大我的立場，為正義，……，要獲得正義，我們到處都是要抗爭的。對支配者抗爭，對一切反叛我們窮人的人們抗爭。<sup>20)</sup>

合群與抱平這兩個角色與「醫生」之間的歧異，其實是1920年代後期社會主義盛行，臺灣的社會文化運動被導向階級鬥爭路線時，左翼知識分子宣告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對立決裂之表徵。而在這種對決中，我們也看到作者呈現出日治時期如「醫生」一般的知識分子，面對殖民者與左翼運動陣營時的投機與不堅定。因此若說王詩琅〈沒落〉中的「耀源」，是知識分子從事啟蒙文化運動時，潰敗者虛無、頹廢表現的典型代表，那麼，〈失敗〉中由解放戰線退下來的「醫生」所代表的，則可說是該時代臺灣知識分子喪失理想後潰敗之曲的變奏吧！

前文關於不同知識分子角色類型的討論，不論是角色對殖民地處境的對應，或因思想路線差異而產生的衝突與心理困境，總合匯聚後便成為王詩琅〈沒落〉中的「耀源」：曾參與殖民地台灣最蓬勃社會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小說中學生時代的「耀源」面對的社會運動情境是：

他的師範學校在校時代，正是一切異了思想的系統共同合作。含蓄的文化協會剛展著瓣，燦爛地開花之啟蒙的黎明期，……。…臺灣也漸由啟蒙的文化運動進入本格的社會運動之分化期的當兒，他們無產青年一派計劃的文化協會占領也成功了。<sup>21)</sup>

這段敘述如實地說明了臺灣在1920年代前半，文化協會成立、社會文化運動積極開展，以及進入1920年代後半，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主導臺灣社會運動實踐方向，並導致社會文化運動方向分歧的現象。「耀源」被形塑於這樣的背景，實則是通過當時所謂的「文化協會會員」、「共產主義者」、「激進分子」，這類完全

20) 同前註，頁72，76。

21) 王詩琅，〈沒落〉，收入張恒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47。原作寫於1935年6月30日，原載《臺灣文藝》2卷8號。

與當道背逆的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而展現其身形。然而面對滿洲事變前後，台灣的「社會運動像在颱風前的燈火一齊吹滅」<sup>22)</sup>，而「耀源」及其同時代的許多知識青年，也被捲入檢舉的漩渦。被捕轉向後因現實的挫敗，兼且面對奔湧而至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大恐慌的浪潮，使得主角在精神上成為與自我疏離、現實中與家庭疏離、社會疏離，理想幻滅後的精神危機，終而使他自我感知為「任狂瀾怒濤玩弄的，失了舵的漂舟」<sup>23)</sup>一般的多餘的人。

「耀源」可說是日治時期作家塑造出的，從社會運動陣營及現實生活戰線敗下陣來的典型人物，他對於一切皆提不起興致：

對一切失了感激，失了追求目標的氣力的現在，老實除酒館賭場稍會興奮癱痺他的神經而外，別的都不甚會惹起他的注意。他也想這傾向是壞的，是要克服的，但緊張的內心的爭鬪，不知幾時也就自然地放鬆，終而無可奈何牠了。<sup>24)</sup>

「耀源」一類的知識分子角色，可說是現實生活與理念潰守的雙重敗退者。在「耀源」身上，我們看到了當時部分臺灣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文化啟蒙運動之後，受迫於現實中殖民者的威勢，消褪了他們對於理想追求的熱情，因此而從與殖民者的鬥爭行動中敗下陣來，他們狼狽踉蹌的身影，和朱榮堅決而充滿鬥志的積極行動者的形象，是充滿對比的。然則曾經充滿鬥志與社會批判力的青年知識分子，卻在令人苦悶無力的處境中，因參與社會運動而嚐受了兩年牢獄之災後，他離棄了所信奉的主義思想，並與自我存在產生嚴重的疏離感，自現實退守後且墮入虛無頹廢的深淵，成為一個在現實中無路可出的敗退者，精神上背棄自我理想的負傷者。

「耀源」這個角色呈現的心理困境是：一個「小布爾喬亞」出身的知識青年，最初因對現實改革抱持熱望，且嘗試以積極的手段對抗受殖者的宿命，因此熱切地投入共產主義「無產青年」的行列。然而在現實行動挫敗，時勢又在統治者大舉檢肅而遽變後，其不僅無法自被殖民與宰制的疏離經驗中脫困，且對自我存在產生了本質上的疏離感，並以資產階級頹廢、荒誕的生活，消沉地對抗自

22) 同註14，頁48。

23) 同註14，頁42。

24) 同註14，頁47。

己「懶氣、倦怠、空虛的敗殘者的虛無感」<sup>25)</sup>。〈沒落〉裏有一段話，十分真切地註解了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從事社會文化運動時的心理困境與矛盾：

英英烈烈從容就義，大聲疾呼那有什麼稀罕。但耐久地慘澹辛苦，走充滿荊棘的苦難之道，卻不是容易的。路是明而且白。祇是能夠不怕嶮嶮崎嶇，始終不易，勇往直進的現在有幾個人？自己已是宣告自己的無能了。拋棄父母朋友妻子，還要貫徹主張，做擔負未來的階級前衛，和密網滿佈的資本主義拼命，不是像自己的意志薄弱的做得到。所以由戰線篩落也是當然的。但要醉生夢死地過去又是不可能了。<sup>26)</sup>

這段話相當程度解答了：為何在日治時期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多半是以「現實的敗逃者」的姿態登場，而較少如〈決裂〉中的「朱榮」，或如〈嫌疑〉中的「啟宏」，在遭遇現實勢力之逼壓與挑戰時，即便面對被關押的威脅時，仍能掛念著「無時無地都在活躍著，鬥爭著的人類」，並且振振地說出：「這樣的一個政府，真是太會無端生事了，這無異是在強迫著人民起來革命，更無異是在替社會主義撒傳單」<sup>27)</sup>。被殖民者無從擺脫的疏離經驗，以及在自我對詰之後對自我人生棄守的疏離感，其實雙重地在「耀源」這類知識分子身上被具體形塑了。類此的知識分子內心生活被形象化的描寫出來，不論是曾參加社會運動或具教養的一般知識分子，他們的精神歷程、心理歷程，在日治時期小說中往往被普遍連續而詳盡地記錄下來。這些虛構的小說文本讓我們得以掌握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心理困境，及其為何會對自我產生疏離，會對整體存在處境產生疏離，並烙刻下負傷者的印記。

王詩琅〈十字路〉，同樣描寫1920年代末統治者對全島左翼進行大檢肅時，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形象，而這些知識分子共同面對的「典型情況是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窘困」<sup>28)</sup>。〈十字路〉中，主角「他」被形塑為懷抱著追求現實榮達的青雲之志，而對當日從事社會運動者的熱情無法理解的對比角色。「他」對於「公學校同窗，在鬧著甚麼文化協會，研究什麼社會問題」，「一

25) 同註14，頁47。

26) 同註14，頁51。

27) 楊守愚，〈嫌疑〉，《楊守愚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164、163。原載《臺灣新民報》第363-365號，1931年5月9日、16日、23日出版。

28) 同註8許達然文，頁2。

點也不去睬他們，祇一味向自己的榮達的路邁進」<sup>29</sup>）。但中等學校畢業的「他」徒有青雲之志，終究受挫於內臺人差別待遇，拼命努力但升職之路始終受阻，兼以在生活重擔的逼壓下，青雲之志終如幻影般拋開了。「他」是在多年的職業煎熬中，才憬悟到夢想依舊是夢想，現實也仍是那苦悶無出路的現實，即便再努力也無法讓自己從被殖民者的疏離經驗中脫困。漸漸地，他便如「耀源」一般被引向自我放縱的路途上去了。類此的人物典型，無力堅持理想信念—不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或資本主義價值信念，終被現實波濤席捲而去的最被熟知的角色，最被熟知的當如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陳有三，本文稍後會再討論。

在主角「他」的記憶中，「定秋」的形象其實是相近於〈決裂〉的「朱榮」，兩者皆是在社會運動實踐過程中，因追求信仰的實踐而遭殖民者逮捕的被迫受害者。這樣角色在日治時期小說中為數不少，他們在被殖民和宰制的疏離經驗裡，採取抗爭的姿態，試圖掙脫疏離的存在處境。〈十字路〉中「他」與「定秋」兩人，分別在現實生活的搏鬥，與革命解放的路途中遭遇到的挫敗。文本中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共同交織出在統治者以剝削歧視為本質的殖民政策統御下，知識分子被迫在錯亂壓抑的社會現實中掙扎；並註定要在實際生活之肉搏，和改革社會之理想的道途中失落，從而扮演被動者、敗退者角色的宿命。而在這種宿命的悲感之中，也疊現著全體臺灣人在現實與精神上遭受挫敗的傷痕。若說「朱榮」與「楊君」一類的角色，是社會主義思想引領社會文化運動並風靡臺灣的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扮演社會啟蒙者、積極改造者的理想典型；那麼，「耀源」與「定秋」代表的就是這種理想破滅與退避的具現。若說「朱榮」與「楊君」是左派知識分子理想身影的形塑，那麼「耀源」、「定秋」則是左派知識分子在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自臺灣社會文化運動潰散時「敗退者」的顯影。在這類角色身上，我們見及理想主義失落幻滅後，困居於台灣被迫早熟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的小知識階層，他們孤獨地面對都市生活的誘惑與苦悶，並且在物質的世界中將自我客觀化，形成自我矛盾的心理困境與疏離感。

29) 王詩琅，〈十字路〉，張恒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74。原作寫於1936年4月3日，原載《臺灣新文學》1卷10號，1936年12月出版。

## (2) 「負傷者」精神系譜的開展

日治時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角色，除了前述具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特質，投身社會改革具行動者身分的知識分子外，同時更有大批淪入無產階級境況，但對現實卻無力反抗的知識青年。鄭登山〈恭喜？〉中，公學校畢業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他」，因為父親病故，為了生活「終不得不扶母攜弟移居到臺北求生」<sup>30)</sup>，然則終究還是無法為母親與幼弟求得基本溫飽，但為謀生計也只能自暴自棄終日徬徨徘徊街頭。類此的角色於日治時期小說中往往以受過現代化教育的失業者、無產者形象出現。而這些角色對於自身處境的哀嘆也常類近於〈恭喜？〉裏的「他」：

本來是個極其穩健篤實的模範青年；然而一到繁華都市——貧富懸殊——民族差別的臺北，痛切地歷過「生產的後備軍」的苦楚，於是他平時的思想狀態便因之有點動搖起來；尤其是當臨時郵差在遞送年賀狀的十日間，所展開在他面前的極其露骨的矛盾現象，更使他勢不得不強烈地對於現社會感覺着無量的不滿和否定的意識出來了。——這樣人們在時間上雖一般地在迎新春，然在處境上却有貧富民族之分；所以人家都口口聲聲在說「恭喜」，而他却不得知道「恭喜」是在那裏？<sup>31)</sup>

引文中的「他」與楊守愚〈元宵〉的主人公宗澤一樣，同為窮苦的無產青年，宗澤面對都市生活中紅男綠女的奢靡浪費，以及自己無法企及的資本主義生活充滿惱恨。楊守愚在另一篇〈瑞生〉中，描寫「斯文人」瑞生因為經濟不景氣的世界洪流，而被掃落到失業大軍之中，百般求生卻無路可走只能不斷吞嚥生活的苦汁。反諷的是，當這些角色於現實中無路可出時，心理上想要暫時逃開現實困頓時，往往是靠向疏離他們的布爾喬亞式的物質情境。因此口袋只有一銀角卻到咖啡館尋樂的宗澤，因女給對自己的冷落，甚而連一口咖啡都不及喝便狼狽逃開了，但終究也只能哀嘆：「樂一樂，唉，現在不更苦了麼？呸！黑貓！」、「唉！黃金的世界！」<sup>32)</sup>而餓著肚子踽踽街頭的瑞生，聽到戲院傳來的歌聲時，彷彿自

30) 鄭登山，〈恭喜？〉，《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1：一桿秤仔》，台北：遠景；1997，頁212。作於1927年12月20日，原載於《臺灣民報》189號，1928年1月1日出版。

31) 同前註，頁216。

己「舊日的青春底心，在這聲色的刺激之下復活了」，於是他選擇衝動地蹬牆而上想看免費戲，因為他想要「忘卻家庭、自己，忘卻挨餓與無歸宿，更忘卻鄙視、蹣跚的痛苦」<sup>32)</sup>，但結局卻是當場被逮。但是當這些角色狼狽地被資本主義價值狠狠羞辱時，世界仍舊如常，紅男綠女調笑如常，絃歌鼓樂仍在吹吹唱唱，這使得想要融入資本主義物質氛圍的無產知識青年，感到更大的失落與屈辱，也更深刻感到無法融入的社會疏離感。

在這類角色的忿忿中，涵藏的不僅只是他們的自憐自艾，也透露出他們對於自身無路可出的殖民地處境之可奈何，這其實也是20世紀初以來大約三個世代的台灣知識分子對其自身處境的共同感知。檢視這類「負傷者」書寫，似乎構築出日治時期知識分子以敗退者形象為主軸的精神系譜。此類負傷者身影的勾勒，看似以敗退者登場或出場，描繪因現實體制施加的傷害而產生的精神嘶傷或潰敗，其實這些角色實際上也荷負著作家以負傷書寫為手段，以揭露為目的的抵殖策略。陸續出現於不同小說中的知識分子，被形構為一群受近代化教育的台灣知識階層，因為殖民體制差別待遇的壓制，以及資本主義價值主導，而在生產過程中被異化的情境，大部分的知識階層無法如自己所信仰的：一分努力一分收穫，在強調「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們反而被自己無法掌控的外在物質世界控制，並於其中將自我客觀化。他們的知識教養無法安穩他們的生活，更無法讓他們確認自我的存在價值，反而加深了這些角色的自我疏離感。這些被資本主義輾壓拋棄的角色們，面臨的是即便受了教育，但「知識」卻難以讓他們維持基本生存條件的窘困，從而也使他們在心理上對自己的存在處境，感到巨大的不滿與困惑。

在這些角色身上可以很清楚辨識到，身為被殖民者與無產者心理與經濟雙重困頓的傷痕，面對無法逃離的殖民體制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時，螳臂擋車無以自立。他們連自己的勞力和工作都屬於資本家，因為無法主宰自己的生活，

32) 楊守愚，〈元宵〉，《楊守愚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140。原載《臺灣新民報》第357、358號，1931年3月28日、4月4日出版。

33) 楊守愚，〈瑞生〉，《楊守愚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273。原載《臺灣新民報》第404-406號，1932年2月27、3月5日、12日出版。

而感受到一種徹底無力的疏離感。這一類在現實中成為無產者的知識青年，他們深刻意識到自己在殖民地與資本主義雙重壓迫的社會結構中，個體價值徹底被粉碎，因為無法擁有生產工具的他們，不能主宰自己的工作與生活，面對金錢衡量一切的世界，他們面臨的是被時代輾壓而去無路可出的悲哀。而這種對臺灣人無路可出困頓及醜惡處境，毫無保留的揭開表象直指其精神負傷的核心，卻正是對殖民者的奮力對話，也使小說中對負傷者幽深苦楚敗退處境的書寫，成為另一種嘗試突圍的對話策略。

除了前述困居資本主義經濟與殖民地體制複雜社會結構中的無產知識青年外，尚有「為數不少、完全以日文寫作的知識分子小說」<sup>34)</sup>，以戀愛與婚姻作為貫串這些小說的重要主題。當時的小說創作中，對於「我」的自覺，最先是以「戀愛」作為確定「個我人格」的首要命題，以〈她要往何處去〉為開端，描寫追求個人情感之正當性；其後以「戀愛」作為主題的作品中，漸漸出現了以戀愛至上主義者為主角的作品，如夢華〈她〉，朱點人〈無花果〉，瘦鶴〈出走的前一夜〉，吳濁流〈泥沼中的金鯉魚〉，以及巫永福〈山茶花〉，吳天賞〈龍〉、〈蕾〉，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等。然而在經營小說的婚戀主題之際，小說家更深層關切的往往是主體的自我覺醒，以及覺醒後的心理矛盾和衝突。而這些小說處理主體自我追尋，以及對愛情熱切想望、婚姻卻無由自主這類的題材時，往往塑造出具濃厚個人主義色彩，甚而傾向於苦悶與頹廢心理狀態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作品的「戀愛」主題，也可視為知識分子在大檢肅氛圍下，以（理想）戀情受挫為喻，作為自我挫敗、精神挫傷的寓託。

但在1930年代中葉左右，小說中開始出現更多的蒼白頹廢的知識青年的形象，這些知識青年常以「叛逆者和流亡者的姿態出現」，同時「他們用以抗拒新、舊體制和價值標準的，幾乎沒有例外是屬於個人主義的主觀的、抽象的訴求」<sup>35)</sup>。這些角色往往依憑著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憑藉著個人的價值追求與力量，意圖奔赴自己人生的美夢，但在這種個人主義想追求自我價值的實踐過程

34) 施淑先生，〈日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頁115。

35) 同前註，頁116。

中，具啟蒙意識的知識階層在背負受殖者印記的同時，終不免必須與殖民地現實，以及台灣社會尚殘存的封建體制與傳統價值交鋒，於這些知識青年也就不免陷入無路可出的精神困局，且往往在掙扎中沉淪或自我毀滅。這一類角色與他們無從主宰的破碎的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無從解決的矛盾，不論從巨大的外在世界，或到他們內心對於自我價值信仰追尋的失落，都使他們的角色性格存在著一種對社會的消極不滿，而他們抗爭的方式卻往往是逃避、嘲諷、甚或是自我放棄或毀滅。

在吳天賞的〈龍〉中，男主角「龍」深受幼時父母所定的婚約所羈絆苦惱，他是一個天資聰穎的思索型的青年，抱定若無法覓得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則寧可終身抱持獨身主義。但是當「龍」面對未婚妻生死以之的哀求時，卻發現：

平時，他老是思考著如何使自屬的民族，從無知解救出來，但此刻，他卻面臨了一個可憐女子死亡的切身問題。他覺得他的戀愛至上主義的信念，遭受到以一生為賭注而去挽救一個人，也是極具價值的這種良心的理論不停侵蝕。<sup>36)</sup>

然而即使「龍」最終因人道主義的良心不安所趨使，而與未婚妻結合，但是悲劇仍不可避免，他與未婚妻二人，婚後一個月即雙雙自殺。巫永福的〈山茶花〉則描述一個留學東京的青年龍雄，苦惱自己擺盪於月霞、秀英這兩個女采的愛情。在這個戀愛事件中，橫互著「同姓不婚」的習俗。龍雄意識到自己與秀英的「愛是無上的力量」，卻也明白傳統習俗荒謬而無可抗拒的力量：

正因為淵源於這種習俗的道德律是不成文法，它的確成為看不見的恐怖。看起來，大眾所承認的這套不成文法，一定會向一些人投下不幸的巨石。<sup>37)</sup>

然而龍雄一方面憤怒於沒有根據的、愚蠢的習俗，但選擇的對應方式，卻是「不想去理解這樣的習俗，也不應該去理解」<sup>38)</sup>。兩篇小說中的主角都遭遇到不能舒展自我個性的痛苦，而這種悲哀苦悶是個人主義思想必然會引起的，因為對於

36) 吳天賞，〈龍〉，《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3：豚》，台北：遠景，1981。頁302。原載《福爾摩沙》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出版。

37) 巫永福，〈山茶花〉，張恒豪主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247。原載《臺灣文藝》2卷4號，1935年4月出版。

38) 同前註，頁247。

自我傾向強烈，具有熾熱情感與堅定意志的「人」而言，為了主張自我的獨特性，必然與外在的世俗環境有所爭辯、有所衝突。而「龍雄」與「龍」——尤其是龍，正是這類具有明顯自我覺醒意識的「現代人」，這兩個堅持戀愛至上論的個人主義者，同樣遭遇到近代人在個人生命的自覺，與現實中定規習俗之間的衝突。也就在這種無力排解的衝突與對立之中，使得小說裏這兩個身處在二十世紀初的角色，其內在的衝突與苦悶被強烈化、深刻化了。面對種種習或俗道德律與個人之間的對決，充滿近代自我覺醒意識的台灣知識青年，不惜以出走、拒絕了解、拒絕接受、甚或自我毀滅等激越的手段，表達他們與傳統決裂、掙脫束縛的決心。

在〈龍〉中作者藉敘事者「我」，對無法調合的禁梏人心的封建意識，與自由的個人生命展現之間所造成的悲劇，以及近代人在個人意識覺醒後，苦悶、憂鬱的心靈作了一個註腳：

到如今，我仍能歷歷然想起在鹿港的海岸那舉目盡是鹽田、芒穗隨著海風披靡、夕日沒於地平線下的情景之中，我的朋友龍滿心誠懇地在向未婚妻說明人世的不如意及人性的醜陋，以及死亡是多麼美好，它可化解世間的一切不平的可憐姿影。<sup>39)</sup>

這段話為我們映襯出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除了以社會文化運動者的形象出現外，身為「現代人」的他們，處於瀰漫世紀末頹廢情調的二十世紀初，充滿厭世、苦悶傾向的心靈。

這樣的角色，也集結地出現於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作者以其特有的文字風格，勾勒著戰爭期前後台灣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心靈圖象。來到南方小鎮的陳有三是懷抱資本主義價值，做著出人頭地美夢的知識青年。初到小鎮的陳有三是：

唯有擁有新的知識才感到一種自尊，才能俯視聚集於他周圍的同族們。要他放棄新知識，簡直就是要將他還原於被某些人所卑視的同族。要把他推落於沒有教養而生活程度低的泥沼似的生活這對他來說是無法忍受的。<sup>40)</sup>

39) 同註29，頁302。

40)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一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30。

然則他實際面對的卻是滯悶到幾近靜止的小鎮氛圍，遇見的是在婚姻市場中不斷被算計估價的青年男女，鼓吹著金錢萬能，但卻被妻兒家庭牽絆，困在無路可出生活重擔裏的同事，還有因種族歧視的差別待遇而造成的，遙不可及的上升之路。小鎮中唯一以冷靜之眼觀看這個世界的是林杏南長子，一個以閱讀文學作品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對抗腐爛可怕生活空氣的社會主義青年，但這個沒有姓名而早逝的知識青年，在滯悶碰壁的現實中卻是難以存活的。

在這樣的氣息中，陳有三最初對同事、朋友甘於現況，時時關切的是金錢或女人的話題，而滿足於現實中些許的享樂，還沈重地提出：

若要對立身處世出人頭地死心，要放棄知識的探求，而將我們年輕人的向陽性摘掉後，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不是只有無意義的生命殘骸嗎？<sup>41)</sup>

然而最終陳有三還是失去了向陽性。小說末了最初力圖上進的他，已不再寄錢回家了，而只一味地將自己的理性與情感沈溺在酒中。而這個困居知識青年，從自己在象徵著台灣的南方小鎮的生活中，

感到湧上來一脈陌生的陰鬱的歡樂。他放棄自尊、知識、向上和反省，發現緊緊抱著露骨的本能、徐徐下沉的頹廢之身，竟有極為合適的黃昏荒野存在著。<sup>42)</sup>

而那一片失去了向陽性，內心中昏黃的荒野，也同樣出現王昶雄的〈奔流〉。〈奔流〉中的小鎮醫生，不經意見看見才三十歲出頭卻華髮早生的春生，意識到那一頭白髮正是春生掙扎於現實，不顧一切扭曲自我，向無可逃脫的受殖者宿命的存在桎梏戰鬥的表現。因為意識到春生想要從台灣人的「朱春生」，強行蛻變自己為日本人的「伊東春生」，強烈地想要讓自己：

成為一個道地的內地人，是要鄉土的土臭完全去掉，為了這個，連親生的親人也非踩越過去不可。在學校，或者在社會接受純日本化青年教育的年輕人，回到家門一步，就會被放到完全不同的環境裏。這裏有本島青年雙重生活的深刻的苦惱。<sup>43)</sup>

這樣的理解，讓醫生有一種「想痛哭一場的心情」，春生的白髮與春生在墓

41) 同註33，頁28-29。

42) 同註33，頁47。

43) 王昶雄，〈奔流〉，張恒豪主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頁247。原載《臺灣文藝》2卷4號，1935年4月出版。

地對親生母親冷漠無情的形象交疊，終而使醫生忍無可忍地，連呼著「去你的！去你的！拔起腿從岡上往山下疾跑起來。像小孩子般地奔跑。跌了再爬起來跑，滑了再穩住地跑，撞上了風的稜角，就更用力地跑。」<sup>44)</sup>這個跌跌撞撞逆風奔跑的形象，也正是日治時期小說中，知識青年為了逃離那無可逃離的歷史宿命，不自覺地從昂揚正向的抱負，趨使他們放棄自我，或沈入自我放縱 / 放棄的深淵，或以扭曲自我的負傷者形象活著。

## 5. 結語：負傷者的困居與突圍

綜觀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知識分子的身影，他們的心理困境與疏離感，源於無可逃離的歷史宿命，所處的時代中，追趕不及又無從實踐的理想（生活 / 世界）最終成為空談，成為知識青年否定自我的一個反諷，他們奮力追求接受的思想、理念、價值觀，完全無從實踐於生命之中。這些角色因此產生了一種巨大的疏離感，知識的實踐價值遭否定，經濟上無從安身立命，理想（生活 / 世界）又彷彿遙不可及。於是這些知識青年無從由自己的知識或工作尋得存在意義，而殖民地處境與資本主義價值又主宰了他們的命運，終於使得這些自1920年代末即大量出現在小說中的「知識分子」，不斷被表現為充滿無力感、無意義感的角色，因為他們意識到（殖民地）世界是他們無從掌握的。這些負傷者的身影，其實同時交纏著殖民地命運的悲哀，與個人主義思想、社會主義理想無由實踐的困限。知識分子通過虛構文本表現理想性的集體幻滅，以及在殖民地現代化進程中逐步被改造的感覺結構，如何負載新的價值，及其個人主義情感之失落。在此種躍進式且過度早熟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的感覺結構中，身為社會菁英的知識階層將他們的身影，附貼於小說文本中的諸多角色身上，並著力於表現角色的窘迫與無路可出的心理困境，甚或進而以頹唐小布爾喬亞式的個人意識，對治一切讓他們力不從心的現實。

44) 同註36，頁363。

本文以日治時期台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為中心，觀察他們在作家筆下呈現的角色類型與精神象徵系譜的差異。筆者認為，文學作品書寫往往可對應作家當時所處的感覺結構，因此，重新檢視知識分子在小說中建構的思想意識，將發現慣於透過論述宣說基進理念的台灣知識分子，由於遭遇理想與現實雙重失落，作品內的知識分子，往往與現實裡鼓吹革新改造的行動者角色存有落差，反而更常以理想失落與生活挫折的角色典型出現。我們也因此可發現在歷史現實情境與虛構小說文本中，大量湧現兼具啟蒙者與受殖者雙重印記的、負傷的知識分子。其次，小說中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雖皆以左翼知識分子的光譜登場，但卻可區分出「理想者」與「敗退者」二種典型，而後者的登場頻率又遠甚於前者。這一方面反映了台灣自1920年代後期愈趨分歧的社會文化運動路線，另一方面也是作家面對現實困境與精神危機的內在投射。

另外，小說中知識階層身臨物質 / 精神的雙重異化情境，分別投射著無產知識青年以靠向布爾喬亞作為逃避現實的姿態，以及透由婚戀主題凸顯主體覺醒的思索，與覺醒後的心理矛盾和衝突，而此類題材塑造出的知識分子往往具備扭曲自我的負傷者形象。然則，在日治時期大量出現於小說文本與歷史現場的敗退者身影，絕不僅只是作家 / 知識分子挫敗情緒的投射，也非單純只是標記著殖民地人民敗退不振的精神樣貌。其中更有著台灣人以各類型負傷者姿態，出入虛構文本與殖民地現實的抗爭中，即便面對無路可出的碰壁時代，仍要奮力揭露殖民不公的積極意義。因為在這些知識分子類型的小說中，一方面除了真實反應日治時期感覺結構中實存的個別情緒外，其情感模式中的情緒特徵，也對應著以「負傷者」形象作為出口的集體精神圖譜，及其所震盪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特性。以敗退作為進路，揭露無路可出的困居作為手段，以精神 / 現實傷痕的書寫成為抵殖的利器，而其對知識分子負傷者身影書寫的取徑，也具體以知識分子的困居，刻劃負傷者書寫的精神系譜及突圍路徑。

## 參考書目

### 1. 中文文獻

#### 1) 小說集

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1:一桿秤仔》,台北:遠景,1997。

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3:豚》,台北:遠景,1981。

張恒豪主編,《王詩琅·朱點人合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張恒豪主編,《翁鬧·巫永福·王昶雄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張恒豪主編,《楊守愚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一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

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八冊》,台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

#### 2) 專著

《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台北:東大出版,1991。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

#### 3) 學位論文

陳明柔,《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淡江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3。

#### 4) 單篇論文

陳明柔,〈新與舊的變革:「祖國意象」內在意涵的轉化——試以張我軍文學為中心的探索〉,收入彭小妍主編:《漂泊與鄉土——張我軍逝世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出版,1996。

許達然,〈楊逵小說裏知識分子的疏離〉,《「楊逵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集》,(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靜宜大學台文系承辦,2004年6月19~20日),頁8。

### 2. 英文文獻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92, first published by Chatto Windus Ltd, 1961), p47、p63。

Abstract

Images of the Injured:

The Intellectuals' Psychological Dilemma in Taiwan Fiction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hen, Ming-Jou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psychological dilemma and their sense of alienation in the fiction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had spiritually burdened with the identities both as an illuminator and the colonized when they started to appear in that specific era. On one hand, the colony status is the reality that they cannot avoid; on the other, as they are stimulated by the world view and value formed by modern 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ir time, they inevitably have to break up with the traditi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colonial ideology with their newly formed modern identity. They are simultaneously the pioneers and the reformers of the Taiwanese modern culture but are also trapped powerlessly within the colonized identity, perceiving sense of alienation for being the colonized. At the beginning, most of the fictions which are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lightening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often carry the theme of criticizing the injustice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and the theme of the hopeless agony of the colonized in realist style. As a result, the main characters in the texts are usu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tereotypical activist's images praised by the intellectuals, but they are often the prototype characters of frustration in both ideal and material aspects. The utopian ideal they eagerly pursue has never been realized. What they really burden is the historical trauma and destiny, and also the tragedy of being lost in the colonial reality. Such psychological dilemma embodied in the texts becomes the typical "superfluous man" who cannot fit into the family and society in reality, while alienating themselves spiritually. In these characters we could find that after the disillusionment of idealism, the petit intellectuals who suffer from the precocious colonial capitalism, face the bitterness and the lure of urban life alone, and objectify themselves in the material worlds, forming self-contradictory sense of

alie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lemma. The images of the injured are ofte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colony's tragic destiny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zing the ideal of socialism or individualism. Through the imaginary texts, the authors are able to represent the collective disillusionment of ideality and able to represent how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that has been gradually reformed along with the colonial modernization carries new values. In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constructed under such leaping-forward colonial capitalism, as the elites of Taiwan society, these colonial intellectuals have attached their own images on to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s and thrust to represent the strait, trauma and inability of these characters, and furthermore, to reflect the powerless colonial reality with the dispirited petit bourgeois' person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 intellectuals, psychological dilemma, alienation, illuminator, the injured, idealism

투 고 일 : 2013. 09. 10. / 심 사 일 : 2013. 10. 20. ~ 2013. 10. 27. / 게재확정일 : 2013. 10. 28.